

高级别讨论——第二节

和平与和解：文化如何产生影响？

文化敏感的方法在理解冲突、预防冲突、减轻冲突以及从冲突中复原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如何才能使和平成为可持续发展进程的必要组成部分？发展主体如何有效地建立普世价值观，促成对话，防止冲突？从文化外交在防止冲突、促进和解等方面的成功与失败中可以汲取怎样的经验教训？

背景介绍¹

文化在和平与和解中的作用

**和平不能通过暴力实现；
和平只能通过理解获得。**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对于什么是今日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个问题，人们很可能会给出如下这些答案：全球化，经济危机，以及导致国家、社会及地区发展倒退的过快变化，还有海平面升高等。这些答案令人想到的，正是这些问题所带来的如下威胁：不可持续发展、贫困问题痼疾、不平等问题加剧、整个社会（尤其是年轻人）缺少对未来的展望。然而，这些挑战的核心，则是人们对于和平的长久渴望。也就是说，人们需要找到一条出路，使他们能够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确定的当今世界更好地生活在一起。而今天他们所见证的，则是各种新形式的暴力突发。

因此，今天我们面临的最重要挑战就是，如何通过充分考虑无限的世界文化财富，克服面对“他人”时的“条件反射式恐惧”，尽量完美地实现“在多样性中统一”这一目标。

拥有和平一直都是人类永久的理想与渴望，当然也是我们的权利和义务。然而，在如今这个互通互联、节奏过快的世界里，和平面对着更大的风险。虽然我们可以希望世界大战已经成为往事，但是暴力、内乱与冲突却依然是千百万生命的主题。内部冲突与恐怖袭击的存在使我们认识到，和平的出现绝不是想当然的。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谈判的一个持续过程，和平需要持久的经营、觉悟和积极参与。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投入，眼光长远，将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结合起来：主要包括我们对冲突根源的理解方式，减少暴力的方式，以及实现和解、恢复元气的方式与手段。

今天，所有的冲突都会得到、也必须得到全世界的关注。因为在今日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任何地方的冲突都可能导致任何其他地方的冲突。通信、机会、互联、迁居这些概念以史无前例的姿态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平等、狂热盲信、弱势群体的边缘化等问题，加之对其他文化及其传统、信仰和历史的拒绝与无知，都使和平不得不面临更大风险。

¹撰稿人：安贝琳达·普莱斯和克里斯蒂娜·斯坦卡·马斯提

通信革命使冲突的影响更加明显，因为它们往往会在其实际影响被感受到之前，就已经在虚拟的社交媒体上和博客圈里“发酵”了。过去几年里，互联网及手机的使用使各类数据达到史无前例的数量，这种互联的威力令人震撼，但是其脆弱性也同样不容小觑²。新技术建构了人类互通互联的虚拟框架，对现实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也对不同种类的冲突起到潜在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新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转移和变化的特色，对于它在这方面的影响并无准确的描述。

“目前至少有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在经历着暴力威胁、政治冲突、安全缺失及社会分裂，这是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对社会健康发展影响持久。在遭受暴力影响或易受攻击的国家中，没有一个能够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中的哪怕一项目标。在遭受严重暴力威胁的国家，贫困人口比例比世界平均值高出20%。”³

很显然，要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性，必须坚持维护每一个人的尊严。只有当每一个人的权益得到维护，每一个人的渴望得到满足时，和平才可能真正实现。与此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充满内忧外患，同时也不能达到环境平衡，与地球及地球资源矛盾重重，它的发展就不会是可持续发展。因此，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

文化：发展的内在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就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长久和平的必要因素。事实上，如果我们对文化因素置若罔闻，社会平等的实现和社会凝聚力的增强就无从谈起。只有当从精神、物质、学术、情感等各个维度理解了文化的内涵，及其所包含的各种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时，才可以去考虑如何实现包容性社会与经济发展、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和平与安全等问题，因为文化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文化以其特有而又直接的方式展示并影响了人与可持续发展、冲突以及和解的关系，它决定并构建了长久地解决冲突并恢复元气的路径。因此，作为“渗透在我们生活各方面的一个知识、内涵以及价值宝库，文化同样也决定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及彼此互动和与环境互动的方式。”⁴

The Cultural Workings of Conflict and Peace 冲突与和平的文化运作

和平的定义是“没有暴力”，或者是“没有对暴力的恐惧”，它与一系列因素和现象互相关联，相辅相成，包括性别平等、公平、相应的教育和工作机会、自然资源

² 国际电讯联合会的数据库显示，仅 2012 年一年产生的数据，就多于之前人类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数据之和。还可参见，弗朗切斯科·曼奇尼编，《新技术与暴力冲突的预防》（纽约：国际和平组织，2013 年 4 月）。

³ 《我们期待的未来》，第 44 段。参见：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licy/untaskteam_undf/untt_report.pdf

⁴ 《从绿色经济到绿色社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承诺》，65。

的有效管理、人权保护、政治包容以及较低的腐败程度等⁵。然而，这些因素大多都需要用文化解码，所以只有在一定环境中才能定义。因此，理解文化在探寻冲突根源、发现解决路径方面的核心作用，是获得长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环节，甚至是决定环节。

然而，近期的调查研究表明，在构建和平的过程中，文化维度通常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既是问题的组成部分，又是问题解决过程的组成部分。正如Michelle LeBaron所言：

“文化既是冲突的基本构成，又是冲突解决的基本构成。它宛如一条地下河流，流经我们的生活与社会关系，它所发出的讯息塑造了我们的观念和贡献；以及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评判与认识。”⁶

作为身份、价值以及归属的根源，文化既可以增强社会凝聚力，也可以为社会的排他性和仇外心理找到借口。阿马蒂亚·森曾经贴切地解释过这个悖论：

“身份感不但可以让人感到自豪和喜悦，同时也给人以力量和信心。然而，身份同时也可以用来杀戮——用抛弃来杀戮。……身份感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身份感既可以让我们热烈拥抱一些人，也可以让我们坚决地排斥其他的很多人。排斥带来的困难与包容所带来的美好常常手挽手同时出现。身份既可以是富有和温暖的根源，也可以是暴力与恐怖的根源。”⁷

“基于身份的民族-政治冲突”⁸作为一种新型冲突已经出现，而传统的资源与利益分配方式已经无力解决这类冲突。在解决这类基于身份的冲突时，对资源或权利政治的强调只能使冲突程度更加严重，持续时间更加长久，这与冲突是否涉及资源和其他有形资产并无关系。我们从如下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过去，身份问题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焦点，传统的冲突解决方式非常行之有效。而现在，传统方式已经不是最好的冲突解决方式，或者说不是首选解决方式，因为今天我所看到的战争与挑衅，已经深深植根于几乎不可调和的身份问题中。”⁹

因此我们说，今天的冲突已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少，国家内部的冲突则出现得越来越多。冲突的领导方不再是军队，而是准军事团体。平民也越来越多地卷入交火中。这一切都要求我们重新对冲突解决方式和和解方式给与重新考量。“在这类新型战争中，文化成为前线。”¹⁰如今的冲突在性质上和发展变化方面很好地诠释了如下论点：

⁵ 《我们期待的未来》，第 45 段。

⁶ 米歇尔·莱伯龙，参见 <http://www.beyondintractability.org/bi-essay/culture-conflict>

⁷ 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企鹅出版社，2006)，2-3。

⁸ 杰伊·罗斯曼和玛丽·L·奥尔森进行了详尽解释，“从利益到身份：解决冲突的新重点，《和平研究期刊》，2001年，第38辑第3期，(289-305页)。

⁹ 杰伊·罗斯曼和玛丽·L·奥尔森，“从利益到身份：解决冲突的新重点，《和平研究期刊》，2001年，第38辑第3期，(289-292页)。

¹⁰ 伊琳娜·博科娃在巴黎国际外交学院的讲话，“在战争时期保护文化，”2012年12月31日。

“身份、自我、人格以及身体本身，成为今日战争中的战略目标。非常荒诞的是，战事所要摧毁的不再是人，而是军事战略家们所构想的人性。这种恐怖形式的目标并不是摧毁生命和肉体，而是摧毁一个合理的人道社会中所有的理性。比起军事文化中正式的疆界争夺，暴力文化更加复杂，多维，持久。它可以在参战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生根发芽。¹¹”

文化遗产：推动共同身份

很显然，任何层面的参与者都不可能单独面对这样的挑战。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合作，需要多边策略，需要全球认可并共享的政策，将文化融入到和平构建策略和项目中。我们需要采取的重要行动包括：通过和平教育阻止冲突发生、进行跨文化对话、促进并鼓励文化多样性、发展国际间的科技合作等，当然还要加强媒体宣传，利用信息与通讯技术打击暴力。这些都是包容性政策，强调的是人权、表达自由、公正与平等，以及尊严与对话。

在冲突发生时，对文化遗产的全方位保护是重中之重。“文化与遗产并不是石头和房子，而是身份与归属。他们承载着历史的价值，这对今天的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确保这些遗产不受损失，因为正是它们将我们带到一起形成一个集体；是它们将我们捆绑在一起，使我们同呼吸、共命运。¹²”有三项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公约加强了人们将文化遗产视作身份与价值的观念。它们是：1954年《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以及1972年《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这些公约强调指出，对文化遗产的袭击，就是对人们共同身份的袭击。以文化遗产为目标的袭击绝不会出于偶然，通过摧毁桥梁、庙宇、清真寺、教堂和祠堂，以及手稿和图书馆，发动袭击者切断了被袭击者与过去的联系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号召人们“将文化遗产视作国际安全问题”的原因之一¹³。

于此同时，文化遗产在和解调停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冲突解决后，文化遗产常常成为一个社会重建的有力象征和工具，帮助人们主动冲出暴力循环。重建莫斯塔尔桥和华沙老城，以及将这两项文化遗产编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都是具有象征意义和创造性的和解行动，是抚慰集体创伤的良药。

不久之前，马里为了提升文化保护意识、保护文化遗产，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和行动。这个例子是突显文化在冲突中作用的一个范例：文化既可以引起关系的紧张，而其自身也是一个无声的受害者。保护古代手稿，重建廷巴克图陵墓，也就是阿斯基亚在高厄的坟墓，重建德津加勒博，桑科尔和西迪叶海亚这三大清真寺，禁止该地区文化物品的非法交易，所有这些不但为马里，也为全世界指明了文化保护的方向。蕴含传统的文化产品，随时可以发出人文信息，讲述对话与容忍的重要性，讲述被战争摧毁的身份之重构，讲述为子孙后代留下的希望。

¹¹卡罗琳·诺思通，“恐怖战事与和平良药”，《医药人类学季刊》，1998年第12辑第1期(105-108页)。

¹²伊琳娜·博科娃在世界遗产公约签署40周年纪念晚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2日。

¹³伊琳娜·博科娃在巴黎国际外交学院的讲话，“在战争时期保护文化，”2012年12月31日。

尽管在战争中保护文化遗址、纪念碑以及文化产品似乎是件奢侈的事情，因为战争意味着毁灭和丧生，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保护文化就是保护人民”¹⁴。文化是稳定生活的风向标，是国家和人民重建生活的根基。在调停和解的对话中，很多地区将文化遗产视为核心词汇，是为他们带来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关系和生活的重要资源。

政策链

文化遗产的特色和杰出代表是经过多少个世纪锻造而成的，绝不可能在几小时内灰飞烟灭。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才需要构建更强大的“文化联合”，使文化和对文化遗产的尊重融合到世界和平的建设中。朝着这个努力的方向，2012年联合国安理会的两项决议（2056和2071）迈出了一步。

保护文化遗产本身并不足以构建和平。然而，没有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平就不可能长久。文化遗产不但可以为人们提供共有的身份感，作为人类一份子的归属感，以及和解的途径，同时帮助我们构建了对独特性和“差异性”应有的尊重。使我们卸掉固有的成见，摆脱对未知的恐惧。

当今世界冲突多以文化为核心，所以我们必须通过文化外交，来探索暴力的根源，危机的防御，冲突的解决方式，以及调停和解的策略。反思性对话可以用来重构冲突所需条件，使排他性和苦难转化为言论表达和改革创新的机会¹⁵。冲突，从以文化为先导的角度讲，可以带来身份的构建与包容。

当以人权为基础的文化保护活动能够认可多样性时，尤其是当文化保护活动融入早期主流教育策略时，就可以在多文化的群体中构建信心和忍让，为对话提供一个共同的空间。

以文化为驱动的发展在承认多样性的同时，积极促进个体提高自身参与文化生活、接触文化资产的能力。这种发展模式将会大大促进“共同生活”式的文化建设，从而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安全。

在冲突地区或是受灾地区鼓励文化活动和文化创作，可以使这些地区的人民重建文化身份，重新获得常态感，再次从事艺术欣赏，让战争伤口开始愈合。文化节目也可以培养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欣赏能力，对所有文化中的“普世元素”的欣赏能力，使人们心中的其他文化更具有“人文性”，为相互理解铺平道路。

¹⁴伊琳娜·博科娃在巴黎国际外交学院的讲话，“在战争时期保护文化”，2012年12月31日。

¹⁵参见杰伊·罗斯曼和玛丽·L·奥尔森对“反思性对话”的定义，“从利益到身份：解决冲突的新重点，”同上，296页。